

连环画 百年浮与沉

对很多人来说,连环画是年少时经常阅读的一种书籍,它通过多幅图画展现一个故事。

如果对连环画追根溯源,探究它究竟起源于何朝何代,今天也是众说纷纭。有观点认为,远古壁画上或者敦煌石窟里看到的有着连贯故事的图画,是“连环画”的最早雏形,但是从绘画理念和技法上看,这些图画与人们熟知的连环画相去甚远。

◆ 1925年,连环画称呼才统一

明清时期,一些戏曲、小说、诗歌刻本都有插图,有的小说一回就有一幅插图,如光绪十年(1884年)印的《聊斋》《千古奇观》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《红楼梦》,是这一类型最早的书籍。

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石印连环画的第一部书,是朱芝轩绘制的《三国志》(由文益书局出版)。这部书大概有两百多幅的连环图画,用原来的回目作为说明。不过,这本书的连环性还是不够,也并不通俗。

1918年,上海“丹桂第一台”上演了连台曲目“诸葛亮招亲”“七擒孟获”,朱芝轩约了刘伯良、李涵丞,根据舞台上的形象,制作连环图画。这就比过去的图看上去通俗,并具有连续性。

第一部加说明文字的连环画,是刘伯良的《薛仁贵征东》,这是根据小说画的,往后又发展到民间故事。

当时人们对连环图画的称呼也不统一,北方叫“小人书”,两广叫“公仔书”,浙江叫“菩萨书”,汉口叫“牙牙书”(即孩子书的意思),上海叫“图画书”。一直到民国十四年(1925年),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一部《西游记》,定名叫做“连环图画”,大家才将“连环画”这一称谓统一起来。

◆ “小人书”叫法多于“连环画”

连环画真正得到发展,是在民国二十年(1931年)前后。这时,不但从事画图的人多了,有的画家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。20世纪30年代,上海画小人书的专业画家有几十人,领衔的是朱润斋、周云舫、沈曼云、赵宏本,他们号称连环画界的“四大名旦”。

当时的连环画有两种载体,除了单行本外,报纸的副刊也是主要载体,它们常刊登4至8幅的“四格漫画”,有时会连载好多年。除在原刊物发表“本传”外,还同时在另一刊物上画“别传”。当时最为读者喜爱的,有叶浅予的《王先生》和张乐平的《三毛流浪记》。

对识字不多,而又没有钱进剧场影院看戏的劳动人民来说,读“小人书”能满足他们的文娱生活,更是一种获取知识的途径,因而受到大众特别是少年儿童欢迎。茅盾先生曾在《连环图画小说》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景象:“上海的街头巷尾像步哨似的密布着无数的小书摊……谁花了两个铜子,就可以坐在那条凳上租看摊上的小书二十本或三十本。”

由于少年儿童是它的主要读者,也由于它的开本恰恰适合装入口袋,所以“小人书”的叫法,要多于“连环画”,连环画多用于书面用语,“小人书”的叫法则多用于民间交流。小人书的故事曲折连续性强,文字通俗易懂,所以特别能够吸引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。也因此,旧小人书市场成为新旧文化争夺的阵地,很早就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关注。

早在国民政府时期,许多连环图画作者,就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,秘密绘制“工人斗争”“反日故事”等招贴画及单页连环画,进行宣传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一方面加紧查禁和收缴旧连环画,另一方面,加强了对连环画行业的改造。

◆ 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,是连环画的鼎盛时期

面对文化需要普及,人民急需精神食粮的新形势,作为通俗易懂的连环画,承担起歌颂新时代,赞美建设者的任务。这个时期,国家开始对连环画有计划和有规模地进行选题、编绘和出版。

在国家新政策的感召下,出版社向画家们敞开了大门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就聚集了赵宏本、程十发、顾炳鑫、贺友直、钱笑呆、陈光镒、颜梅华等名家,而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则云集了徐燕孙、卜孝怀、墨浪、刘继卣、王叔晖、任率英、林锺等名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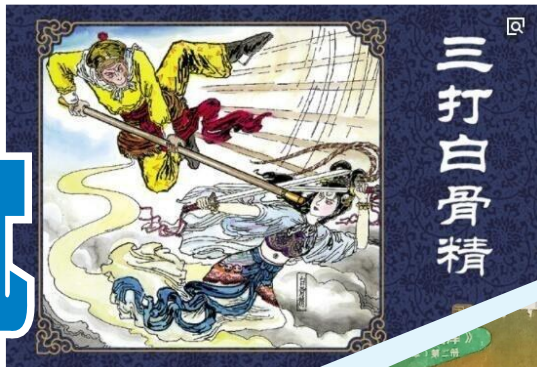
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,可以说是连环画的鼎盛时期。这一时期,连环画的稿费可不低。连环画大家贺友直对自己那个时期的收入毫不讳言:“我接出版社一本书的稿子,稿酬标准是13元一页,一个稿子就是1000多块,我通常两个月就完成了。”那个年代普通工人的收入只有几十元,相比较而言,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。

由于图文并茂的形式不管是孩童还是成人都能看懂接受,所以,连环画成了此时最初级的教育读本。

1951年,全国出版连环画册1840种,总印数为1945万册。至1957年,全国共出版连环画2200种,总印数达1.06亿册。一时间,新连环画被称作“解放书”。

这一时期,出版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好书,诸如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《鸡毛信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红岩》《青年近卫军》《高尔基三部曲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武松打虎》《西厢记》《山乡巨变》《白毛女》等。

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,连环画率先迎来发展的复苏期。国画家、油画家、版画家们都投入到连环画的创作中来。正是这些画家的投入,对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,丰富连环画的表现力,起到了重要的作用,陆续出现如



《最后一课》《人到中年》《雪雁》《月牙儿》等高水平的作品。

这一时期,人民美术出版社相继做了《中国十大古典悲剧》和《中国十大古典喜剧》连环画集,请戏剧大师曹禺作序,请著名美术史论家黄苗子题签。浙江美术出版社组织编绘《世界文学名著》连环画集,辽宁美术出版社的大型古典文学名著《西游记》《前汉演义》,甚至连体育出版社都出版了《神拳》,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《音乐家故事》。

《连环画报》见证了这一时期连环画的辉煌。

1981年,连环画大家贺友直率先打响第一炮,在《连环画报》的第1期推出了他的新作:《白光》。此后,不少名家在《连环画报》发表作品。此后,《连环画报》不断推陈出新,好作品呈群峰竞秀之势。据统计,20世纪80年代中期,《连环画报》的发行量曾创下单期128万的纪录。

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的出版社

都建立或扩大了连环画出版业务,到1982年全年共出版连环画2100多种,八亿六千多万册,这是1949年以来最高的出版纪录。

在连环画异常繁荣的同时,危机紧随其后。这一时期,一个选题会有多家出版社重复制作,导致“跑马书”(人们对当时粗制滥造的连环画的称呼)泛滥,新华书店库房积压严重。1986年,连环画出版量下降到1.3亿册,1987年下降到7000万册,连环画突然便衰落下去了。

20世纪90年代后,尽管有沈尧伊的《地球红飘带》和汪国新的《长江三部曲》两部长篇连环画问世,依然难掩连环画整体向下滑的颓势。

此后,随着电视、互联网以及电子游戏等迅速普及,进一步挤压了连环画的生存空间。连环画逐渐从大众主流文化退居为小众收藏领域。如今,诸多专业美术出版社几乎不再创作连环画,仅对经典连环画进行再版。

本报综合消息

汪曾祺的真性情

激赏,说是“比汪曾祺写得还好”。

冲进屋里的“下蛋鸡”

汪曾祺其实是在新时期被重新“发现”的一位作家。他从20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,因此到八十年代的写作属于“春来老树发新枝”,自然出手不凡。当他接连发表《受戒》《异秉》《大淦记事》等带有散文诗性质的小说时,立即引起了文学界的极大关注,并被视为文笔老到、风格独具的老作家,尽管汪曾祺自己心态很年轻,他也不愿意被冠以“老”的名号。

由于居住条件的限制,汪曾祺先生一开始没有自己的书房,当他构思好了作品,往往没有一张桌子可以让他落笔。他的女儿曾经记过一件趣事,说有时候她上夜班刚睡起来,汪先生就急急忙忙地冲进屋里,铺开稿纸就写。家里人笑他说,那情形就像一只老母鸡,憋好了一个蛋,却没有窝来下。而等他“下完了蛋”,情形又如何呢?汪先生自己有个描述:

“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最充实的时候,也是最快乐的时候。凝眸既久,欣然命笔,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,这样的时刻,真是虽南面王不与易也。写成之后,觉得不错,提刀却立,四顾踌躇,对自己说:‘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!’此乐非局外人所能想象。”

“自报家门”的小说家

汪曾祺的小说属于少而精的类型,笔墨俭省,但旨趣深远,回味无穷。他的作品一经《中国文学》英、法文版译介,便受到了海外读者的欢迎。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《大淦记事》发表于1981年4月号的《北京文学》,英文版的译载日期为1981年10月。从中文定稿到翻译出版,送到海外读者手中,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!这在当年绝对可称神速,自然这也得益于编辑与翻译们对他的作品共同的喜爱与推崇。

1988年,熊猫丛书准备翻译出版汪曾祺的作品集,其中英文版书名定为《晚饭后的故事》,法文版的书名为《受戒》。两个文版的书名之所以不同,是因为考虑到英语国家

的读者较为喜欢平实客观的叙事风格,而法语国家的读者偏爱情感细腻的描绘。英国的学者在为此书做推介时直截了当地称汪曾祺为“另一个沈从文”;而法国的译者则指出《受戒》“写水虽不多,但充满了水的感觉”,这样贴切细致的阅读感受让汪先生大呼意外,因为连他自己也“从来没有意识到”这一点。

而外文版作品集的序言通常都比较简短,汪曾祺却别出心裁,把它变成了一篇洋洋洒洒长达7000字的文章!他借用京剧角色出台时常用的“自报家门”的手法,把自己的家学与师承、作品背景及创作风格交代得极为清晰明了,为西方国家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、顺利进入小说情境做了周到妥帖的铺垫。

“折腾”语言的高手

“写小说就是写语言。”汪曾祺对于语言有着高度的自觉。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映照出的是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。“语言像树,枝干内部汁液流转,一枝摇,百枝摇。”他的小说之所以能牢牢“吸”住读者,令人欲罢不能,就是跟他雅到极致又俗白到家的语言有关。

汪曾祺曾经把使用语言与“揉面”相比:“面要揉到了,才软熟,筋道,有劲儿。”他自己在下笔之前就经常要打腹稿,把语言反复“折腾”,甚至是“想得几乎能背下来”才写的,这也就不难解释他的文字为什么常常显得有“咬劲儿”,韵味十足,令人过目不忘。

由他执笔的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中阿庆嫂的唱词堪称经典:“垒起七星灶,铜壶煮三江。摆开八仙桌,招待十六方。来的都是客,客,客,客。喜笑颜开,相逢开口笑,过后不思量。”这样的句子就是汪曾祺反复“折腾”“揉熟”的结果。

汪曾祺是个通才。这一点可谓得其父亲真传。诗、小说、散文、戏剧,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集精彩纷呈自不必说,汪曾祺精通书画、懂医道、喜美食,年轻时还喜欢唱戏、吹笛,用作家贾平凹的话来说,是属于“修炼成老精”的“文狐”级别。身具这样的才情,自然是“心有余闲,涉笔成趣”,写什么都能写得十分讲究。

本报综合消息



汪曾祺为江苏高邮人,与北宋著名词人秦观是同乡。位于大运河畔的高邮因驿站而得名,它还是久负盛名的咸鸭蛋的产地。汪曾祺就写过一篇著名的《端午的鸭蛋》,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。

沈从文高足 闻一多爱徒

都说大学的中文系不培养作家,但汪曾祺是个例外,他是真正的由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一位名作家。汪曾祺在读中学时就是沈从文的超级“粉丝”,抗战避难时都没忘记带上一本《沈从文小说选》。1939年他从上海经香港、越南辗转来到昆明参加考试,考中了第一志愿——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,终于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沈从文先生。他不但是沈从文的人室弟子,还是其得意高足。“贴着人物写”便是汪曾祺在课上习得的令他受益无穷的写作“诀窍”。有一次沈先生为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打出了120分的史上最高分,甚至说他写得比自己还要好。

汪曾祺自称“颇具歪才,善于胡诌”,大学期间深受闻一多先生的喜爱。闻先生的名言“痛饮酒熟读《离骚》,乃可以为名士”,以及把晚唐诗与后期印象派的画相联系的讲授方式令他记忆深刻。而他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当“枪手”的经历:在闻先生的唐诗课上,他替一位低年级同学代写读书报告,其中对李贺诗歌颇具创见的评——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,故颜色特别浓烈——受到闻先生